# 数字金融能促进农村妇女创业吗？村庄治理与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 摘要

鼓励农村妇女创业有助于提升其经济收入与家庭话语权，进而推动性别平等与乡村振兴。既有研究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农村女性的创业活动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与支持。但是，技术升级并不能直接带来技术的有效利用。本文认为在宏观的数字金融发展状况与微观的农村妇女个体创业行为之间，村庄治理这一中观变量极为重要，影响着数字金融与创业行为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通过匹配数字金融数据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村庄治理与农村女性创业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村庄领导能力、议事协商民主化、信息透明程度、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女性创业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本研究在理论层面强调了数字普惠金融这一宏观发展变量与微观的农村女性创业行为之间存在“最后一公里”问题，而村庄层面的治理能力对此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实践层面，本文认为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村庄的领导者素质、改进协商议事方式、提高政务财务信息的公开频率，进而真正实现数字金融的普惠性目标。

## 文献综述

### 女性创业的发展与挑战

伴随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的积累与发展， 女性对在创业活动与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而逐渐受到重视(JGER Sarfaraz et al., 2014)。初始创业研究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主要关注于男性创业者（JGER）。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女性主要承担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大部分注意力都是倾注于家庭，从事创业活动缺乏必要的支持（JGER）。早期的创业理论也认为男女性创业者具有相似性，从性别角度来细分创业的研究领域并非必要(JGER Bruni et al. 2004)。但是，随着女性逐渐深度参与社会生产与商业经营，女性权利与自由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1998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小企业中女性创业者会议的举行和2009年国际性别与创业研究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nder and Entrepreneurship）的创办，都助推了女性创业研究的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性别差异对创业活动的深刻影响愈发受到重视。Birley（JGER,1989）认为男、女性创业者最主要的不同体现在市场进入策略方面，而这些差异与文化环境及个人经历紧密相关。Brush(JGER,1992)认为男性创业者与女性创业者在人口学特征、心理特质与商业技能方面存在相似性，但是在教育背景、职业、创业动机与创业方式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她认为这些差异与女性对于创业的理解较为相关。与传统经济学将创业作为纯粹获取利润途径的观点不同，女性更多地将她们的商业视作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与个人关系相互交织的综合体。

当前女性创业的独特价值受到广泛认可，但是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阻碍女性创业的制度性因素。女性创业具有独特的社会经济社会效益，能够在赋权、减轻贫困、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性别平等（DigitalEco;”Cesaroni 等人，2017 年）。但当前各国女性的权利状况仍然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女性权益保护仍然面临众多挑战，女性创业仍然面临众多阻碍。这些挑战包括性别不平等、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张力、缺乏可用的金融资源与社会支持（digital eco）以及社会文化对于女性企业家的歧视等（Etim & Iwu，2019 年；Nsengimana 等人，2018 年；Chengadu & Scheepers，2017 年；Mazonde，2016 年）。

### 数字金融与农村妇女创业

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居民创业带来了更多机遇。依靠互联网、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技术，数字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的渗透率，增强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何婧、李超海，2019）。技术进步也提高了农村地区潜在创业者识别社会问题、发现创业机会的能力，同时为创业活动提供灵活性何便利性（Nambisan,2017）。数字金融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束，增加了信息可得性，并提升了农户的社会信任感，进而促进了农户创业（何婧、李庆海，2019）。 网络借贷平台为一些从传统融资渠道获得金融资源的创业者提供了新的支持（2di,Nigam et al., 2019），增强了农产品电商的偿债能力、营运能力与盈利能力，促进了农产品电商的综合性发展。Tran(2014) 也发现数字平台降低了女性开办企业与运营商业的成本(Tran 2014)。数字金融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农户创业，也能够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的间接途径促进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张勋等，2019）。

但技术升级并非意味着实现了居民对数字技术的全面有效利用。 Fatoki（2016）针对南非女性商贩的一项调查显示，成本高昂与技能缺乏是她们使用ICT技术的主要障碍。Malik(2017)认为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创业无法缓解女性所面临的的工作-家庭难以较好平衡的压力。正如 Shivakami Rajani 和 Sunita Panicker（2017 年）所观察到的那样，创业的另一个障碍是印度女性缺乏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和英语知识，这两者都是数字经济所必需的，并补充说她们也“在家做家务”因此无法建立网络并获得支持以建立或维持其业务。WHJR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农民创业，但其作用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方观富等[WHJR4]提出数字金融能够影响弱势群体的创业选择,但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有限。

张勋, 万广华, 张佳佳, & 何宗樾. (2019). 数字经济, 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 经济研究, 8, 71-86.

Malik, P. (2017). *Gendering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 from research to practice using a tensional lens*.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Purdue University <http://docs.lib.purdue.edu/dissertations/AAI10266070/>

NAMBISAN S. Digital Entrepreneurship:Toward a Digi⁃tal Technology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2017,41(6):1029-1055.

### 社区治理与女性创业

目前学界逐渐形成的共识是，推动女性创业不能仅凭技术进步，也需要重视制度与治理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在政策执行与基层社区层面。Rupali Jitendra Khaire ( 2011 : 36) 认为为了激励女性创业，应当出台专门的政策，为女性创业者提供专项经济援助，并且减轻女性所承担的家务[[1]](#footnote-0)。Ayesha Kalim (2012) 也认为出台专门性保护女性产权的法律政策、推动行政透明与法治能够推动女性创业[[2]](#footnote-1)。Zahro认为应该加大对工程学专业女生的创业教育，通过模拟从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增强学生的创业学习能力，降低她们失业的风险。除了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之外，强化行政能力与监督问责也极为重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尽管存在一些支持女性创业的政策，但是由于腐败与寻租的存在，导致政策无法得到有效执行（digital）。通过社区层面开展的技术提升项目，能够提高女性对于数字技术的理解与认知，增强其使用相关技术提升自身收入与经济社会地位的信念与能力（Kamberidou & Pascall，2020 年）。一项研究综述表明也(digital economy paper)，社区与家庭的支持是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的重要促成因素之，包括情感支持、鼓励和以及与业务相关的一些帮助。

Zahro, S. (2016). Applying entrepreneurship as a learning design for engineering education*. World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Vol.14, No.3, 410-415.

、、、Fischer et al. (JGER 1993) 认为为女性在相关产业提供学徒与实习机会有助于女性积累相关的知识，并为日后的创业做相应的准备。

、、、在理解女性创业时需要比较不同的产业以及考虑行业、家庭以及文化的影响（Gundry et al.,2002）。

、、、Ahl(JGER 2006)认为在研究女性创业时有必要引入权变理论以及推进跨国比较研究，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案例的分析。权变理论认为应该仔细讨论外部因素对女性创业的型塑作用，例如立法机构、社会习俗、家庭政策、经济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等。

Goyal 与 Yadav（2014 JGER）一项针对印度女性创业的研究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在创业时，相对于男性而言，面临更多的挑战，特别是难以获取金融资源、承受更多社会偏见以及缺乏自信。她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女性创业的制度性支持以及创业相关的教育培训。

（张强强）创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及主要途径之一。虽然我国的创新创业总体水平已位居世界前列,但在人口数量庞大、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地区,创新创业水平仍有待提高。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匮乏及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是导致农村地区缺乏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根本原因(贾辉,2017)。相对于传统的“输血”式发展,农村地区更需要通过创新创业实现“造血”式发展。为振兴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业投资环境、激发农民创业热情,国家相关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农民高质量创业的政策

文件,加大了农民创业政策支持和人才培育力度。农民创业有利于盘活农业资源、整合生产要素、激发农村生产活力,不仅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带动本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曹瓅等,2019),也可通过创业活动有效解决农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并在就业、教育、扶贫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相比其他群体,农民创业面临的资金周转困难、创业资源短缺、关系网络简单、社会资本匮乏、认知水平不足及心理敏感脆弱等困境更加突出,导致农民创业失败案例屡屡发生,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创业绩效普遍不高(王洁琼等,2018;马红

玉等,2020)。农民创业者如何克服先天劣势、提高创业绩效,成为亟待研究的关键问题。

（张强）经济、社会、心理三维资本是农民创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三维资本中单项资本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资本为创业初期提供了资金投入保障,对农民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是获取外部信息和资源的主要途径,能够显著提高创业资源的可得性,是影响农民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蒋剑勇等,2013;郭铖等,2019)。心理资本作为促进个体成长和绩效提升的核心心理因素,是促进农民将创业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马红玉等,2020)。在创业过程中,除各项资本外,农民的创业能力也对创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农民需要通过持续学习来应对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也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获取有用信息以识别创业机会(朱秀梅等,2019)。在创业活动中,农民只有发现机会,才能有效规避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才能模仿、改进及创新出新的产品或要素集合,并开展后续的价值创造活动。在学习知识并识别出合适的创业机会后,农民需要获取和利用相关创业资源进入创业下一阶段,也需要通过不同途径获取所需的经济、社会、心理等创业资本。目前关于经济、社会、心理等单项资本对创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农民创业绩效的文献相对较少,也忽视了农民创业学习能力、创业机会识别在其资本禀赋与创业绩效中的作用。

（张强）企业、经营管理和收获回报五个阶段。创业活动是指在环境不确定的情境中,创业者或创业企业通过利用其认知和行为,将获取的新资源与现有资源进行整合配置,并利用新机会进行价值创造的一系列相关活动的集合。结合创业过程和创业活动的概念,本文将农民创业定义为农村户籍人口依靠农村自然、社会、经济资源,通过创业信息或知识的学习、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开发、要素资源的整合与利用,进行多种方式的创业活动,最终实现新组织的创立、新产品的开发或新服务的供给,壮大当地经济发展,并实现自我价值的完整过程。2012)。、、、对农民创业者而言,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其开展创业活动并获得成功。农民从金融机构等正规渠道获取创业资源的难度较大、门槛较高,其创业资源的获取更多依赖于亲戚朋友及邻里间的互惠关系等非正规渠道(庄晋财等,2014)。

创业机会识别与创业学习。创业学习是通过获取创业信息和知识来指导企业创立和管理的连续过程,是创业能力提升的关键来源(严杰等,2018)。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可以帮助其快速掌握难以模仿的关键技术。农民创业者由于自身资源的不足,需要同外界建立各种联系以获取创业所需资源,而资源的吸收利用效果取决于其自身的不断学习,在创业过程中,农民创业者可通过学习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进而促进创业成功(芮正云等,2018)。经济资本不仅可以为创业者创业初期及扩张期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学习培训机会,通过创业学习提高经营利润。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农民创业者与具备相应资源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产生学习机会,进而提升创业绩效(谢雅萍等, 2014)。心理资本较高的农民创业者通过积极的心理调节处理情绪问题,使其遇到经营困难时仍能保持乐观心态,通过不同的创业学习模式提高创业绩效。因此,创业学习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民创业绩效,而且在三维资本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

///武汉金融

要: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创业,且该作用在东部地区和乡村地区更明显。

业创业的影响。谢绚丽等[1]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用来度量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新增企业注册数相匹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业有积极作用,并且该作用对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更显著。张林等[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居民创业,还可以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来促进居民创业。马德功等[3]在研究数字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过程中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另一部分学

者利用微观数据对此展开研究。方观富等[4]提出数字金融对传统弱势群体的就业影响更大,但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仍然有限。冯大威等[5]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相匹配,从创业动机的角度对居民的创业行为分类后进

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只对“自雇型”和“生存型”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并不影响“雇主型”和“机会型”创业。

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张勋等[6]利用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Anshari 等[7]

通过理论分析认为,金融技术和数字市场等服务创新会加强农业的可持续性,并在此

基础上构建了 AgroPay 数字市场模型,该模型使所有参与者(农民、土地所有者、投资者和消费者)都能轻松地进行无现金交易,并提供投资、支付、在线购买交易、众筹服务等,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多项便利。Leong 等[8]对印度尼西亚社区的创业行为展开实证调查,揭示了农民创业所面临的经济限制,通过介绍Kanopi、iGrow、Xendit三个平台的案例,总结出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微型企业提供了平等的创业机会。何婧等[9]利用中国农业大学开展的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提出数字金融使用对非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影响较大,并且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户的影响更明显。

金融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经济和政治体制健全的情况下,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创业活动水平就越高[10]。技术进步能帮助潜在创业者发现社会问题,同时为创业活动提供便利性和灵活性,促使更多人选择创业[11]。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带来了金融的颠覆性变革,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数字金融也将会推动创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或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服务[12]。因此,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农民创业:首先,在融资方面,数字金融拓宽了农民创业的融资渠道[13]。传统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创业贷款的积极性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信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金融机构认为该类贷款风险较高[14];另一方面贷款流程复杂,农民和金融机构双方都要耗费极高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导致农民的正规融资需求下降[15]。数字金融通过提供点对点贷款、众筹、小额信贷等期限灵活的网贷产品,以及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改善还款管理,从而满足农民不同的融资需求[16],提高信贷管理效率[17]。因此,数字金融对解决农民创业的融资难题有重要意义。

在互联网全面普及的背景下,数字金融借助信息化技术进一步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28],提高了农民的金融可得性,为农民参与金融市场提供了便利[30—31]有助于提升农民的创业水平。

李仕玉 数字经济

创业机会信息 创业机会识别 （民众协商）

创业学习 （村干部创业带动）

创业资金获取（村干部监督/公开）

市场渠道拓展 （？）

妇女创业现状研究 妇女创业现状、缺乏指导，面临困难

。因此,数字

金融的快速发展丰富了农民进入金融市场的途径,

\数字金融实际上是一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分配性资源，作为上级政策与民众之间的枢纽，村干部事实上享有资源分配的信息与权威。

现代化发展理论与女权主义理论分别与农村妇女的两个社会化标签“农村”、“妇女”紧密相关，为理解农村妇女的创业行为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现代化理论认为创业需要一定的场域环境的支持，例如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发达的交通物流网络，友善的社会舆论环境等。而女权主义理论从性别视角出发，认为男性与女性在创业机会识别能力、创业风险承受能力、创业成本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除此，个体社会资本理论更聚焦于个体在教育、社会网络、社会支持方面的不同，认为这些因素也会对女性的创业意愿及行为产生影响。

城乡发展差异的存在使得农村居民在创业时面临更多的障碍。？分析农民由于教育水平的不足，更难识别相关的创业机会。农村地区的交通运输与信息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供给相对不足，导致农民创业缺乏必要的外部支撑条件[[3]](#footnote-2)。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服务的不足也弱化了农民抵御业失败风险的能力。同时,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融资渠道不畅、创业培训不足等问题也进一。除此，还有许多阻碍。

而女权主义视角更聚焦于女性的社会角色与性别分工，认为相对于农村男性居民，农村女性在创业时还需面对额外的家庭与社会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家庭劳动分工对女性家庭角色与功能的期待，即认为相夫教子、照顾家庭是妇女的”天职”。

个体社会资本差异。家庭网络是农民创业的重要信息来源，直接关系到农民创业机会的识别能力。

农村治理普遍呈现出精英主导的特点，“”能人带动“”是村庄实现发展的重要方式[[4]](#footnote-3)。村落干部素质是制约农村创业的重要因素，农村创业要求村干部具有理性的思维模式，丰富的知识储备与权威配置，因而村干部权威将有助于提高村落的创业活力。而农民创业又是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村落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村落和谐发展、农民居家乐业的动力之源。基于此，本文分析了村落创业活力在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之间的中介效应。产权作为村落土地制度的核心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只有充分落实村落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用益物权，完善村落集体产权确权和保护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才能切实防止组织内部少数人侵犯、非法处置村落集体资产，提高村干部权威对乡村经济发展与村落和谐作用的重要作用。村长专家权威中的学历则对村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以及村民幸福感均产生显著的积极作用，说明与传统的声望权威相比，知识权威对村落发展的作用在上升，也进一步说明大学生村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类。第一类是利用宏观数据进行研究。如谢绚丽等( 2018) [7]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

数省级数据与省级层面创业数据相匹配,研究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及推广与创业活动水平之

间的关系,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创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类是利用宏观数字金融和

微观创业匹配数据进行研究。如张勋等( 2019) [8]将中国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与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微观数据相匹配,研究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家庭创业的

影响,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但对城镇居民创业行

为的帮助作用有限; 王金杰等( 2019) [9]利用县级层面电子商务发展指数和城乡居民收入

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 CHIPS2013) 匹配数据,研究了县域电子商务水平对农村居民创业选

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电子商务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创业选择及其创业投资和雇佣规

模。第三类是使用微观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和创业数据进行的研究。如模。第三类是使用微观层面的数字金融发展和创业数据进行的研究。如 尹 志 超 等

( 2019) [10]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 数据,研究家庭移动支付行为对家庭创业决策和

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移动支付显著提高了家庭创业的概率和工商业项目的经营绩效; 何

婧和李庆海( 2019) [11]利用中国农业大学开展的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数字

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使用不仅缓解了农户的信贷约

束,增加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而且还通过特有的社会信任强化机制提升了农户的社会信

任感,最终促进农户创业,提高创业绩效。

作为金融发展的一部分,普惠金融是指能有效和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群体提供服

务的金融体系,这一概念最早由联合国于 2005 年正式提出。自此,发展普惠金融成为破解

传统金融体系金融排斥、为弱势群体提供可持续金融服务的方式之一( 星焱,2015

[3]) 。而

依托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而发展起来的数字普惠金融则可将金融服务延伸到传统金融难

以触及的领域,为更广泛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丁杰,2015

[4]) ,

由此推动了普惠金融的发展。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 郭峰等,2016

[5]) ,中国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平均值从 2011 年的 40 提高到了

2015 年的 220,在短短的几年内增长迅速。现有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微观主体经济行为关系

的研究并不多,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的探讨往往局限于宏观层面,如经济发展、收入不平

等及贫困等( 李涛等,2016

[6]) 。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高了微观主体的信贷可得性,并

降低了融资成本,使得创业者面临的信贷约束被大大降低了。因此本文重点从数字普惠金

融的视角研究中国居民的创业问题,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有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

创业概率及创业表现,并剖析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该数据公布了省级、地级市及县域三个层级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本文利用省级

层面的指数与微观创业数据进行匹配。虽然 CLDS 数据也可以识别到城市,但本文 15540

个有效样本广泛分布于全国 159 个地级市,分配到每个城市的样本量较少,尤其是中小城

市,因此本文没有利用地级市层面指数进行匹配[[5]](#footnote-4)。

其中,Entrepreneur ( 1,0) ijt表示省份 j 中的个体 i 在第 t 年是否是创业者的虚拟变量,

若劳动力当前的就业身份是创业者,则该变量取值为 1,若为工资获得者,则取值为 0。个

体问卷中,针对有全职工作的受访者,将其工作划分为雇员、雇主、自雇和务农四种状态,本

文只保留从事非农工作的个体,将就业状态为“雇主”和“自雇”的归为创业者,将工作状态

为“雇员”的归为工资获得者。据此定义,创业者是自己为自己工作,相对于受雇于他人。

社会资本会弱化还是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本文通过引入数字普惠金

融与社会资本交互项,对上述理论进行了检验。表 7 为估计结果,其中第( 1) 、( 3) 列利用

个体问卷中“过去一年给过你帮助的人”作为社会资本衡量指标,而第( 2) 、( 4) 列选取家庭

问卷中的“礼金支出”作为衡量指标,第( 1) 、( 2) 列不考虑内生性,第( 3) 、( 4) 列则利用工

具变量法进行估计。表 7 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与社会资本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

正,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越大。

现代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民创业最主要的影响是提高了农民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给创业者提供资金,而且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可以提升创业者的金融能力。调查发现,创业者中有76.83%的人认为使用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他们的金融能力,而没有创业者中这

一数值仅为64.96%。

课题组询问了创业者认可的数字普惠金融相

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的优势,结果显示,56.48%的农民认为其资金综合成本低,51.16%认为贷款审批手

续简便,43.19%认为审批速度快,47.84%认为贷款期限灵活。说明数字普惠金融优势明显,其放款期限短、所需成本低,帮助农民使用资金更高效,可以满足创业者及时便捷的资金需求。

信息不对称是农民创业的主要障碍,从获取线上行业信息或金融信息与创业关系来看,创业者中有84.15%的人认可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可以提供行业或金融信息,远高于没有创业农民中这一指标

66.42%的数值,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缓解创业者的信息约束,减低创业风险。

(一)数据安全风险和政府监管问题

(二)贷款额度和贷款利率问题

有22.76%的农民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贷款利率较高的问题,16.07%的农民认为贷款额度低是主

要问题。

华农、春燕

武汉金融 王倩

谢绚丽等[1]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用来度量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新增企业注册数相匹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企业创业有积极作用,并且该作用对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更显著。张林等[2]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直接促进居民创业,还可以通过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和服务业发展来促进居民创业。马德功等[3]在研究数字金融对包容

性增长的影响过程中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创业活动的开展,从而实现包容性增长。另一部分学

者利用微观数据对此展开研究。方观富等[4]提出数字金融对传统弱势群体的就业影响更大,但对农村地区的影响仍然有限。冯大威等[5]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相匹配,从创业动机的角度对居民的创业行为分类后进行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只对“自雇型”和“生存型”创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并不影响“雇主型”和“机会型”创业。

随着农民创业热潮的到来,学者进而开始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张勋等[6]利用北大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

为。Anshari 等[7]通过理论分析认为,金融技术和数字市场等服务创新会加强农业的可持续性,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AgroPay 数字市场模型,该模型使所有参与者(农民、土地所有者、投资者和消费者)都能轻松地进行无现金交易,并提供投资、支付、在线购买交易、众筹服务等,为农民创业提供了多项便利。Leong 等[8]对印度尼西亚社区的创业行为展开实证调查,揭示了农民创业所面临的经济限制,通过介绍Kanopi、iGrow、Xendit三个平台的案例,总结出数字金融的发展为微型企业提供了平等的创业机会。何婧等[9]利用中国农业大学开展的农村普惠金融调查数据,提出数字金融使用对非农创业和生存型创业影响较大,并且对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匮乏的农户的影响更明显。

、概念 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或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融服务[12]。

因此,本文认为数字金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农民创业:首先,在融资方面,数字金融拓宽了农民创业的融资渠道[13]。传统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创业贷款的积极性不高,一方面是因为农民信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金融机构认为该类贷款风险较高[14];另一方面贷款流程复杂,农民和金融机构双方

都要耗费极高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导致农民的正规融资需求下降[15]。数字金融通过提供点对点贷款、众筹、小额信贷等期限灵活的网贷产品,以及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改善还款管理,从而满足农民不同的融资需求[16],提高信贷管理效率[17]。因此,数字金融对解决农民创业的融资难题有重要意义。其次,在支付方面,新型支付方式为农民创业的各项交易提供了便利[18—19]。依托于互联网技术的移动支付方式使得农民使用手机即可快速完成支付、转账活动,有效地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范围[20—21],减少了对现金货币的需求[22]。最后,在投资方面,数字金融帮助完善了农民信用体系,进一步促使投资者对农民创业活动进行投资[23]。数字金融运用技术手段全面整合了农民创业项目的资金流、物流等信息,帮助投资者更准确地了解所投资项目的状况,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者的投资热情。

农民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也可能影响农民创业。通过互联网学习提升创业所需的相关技能也是

数字金融影响农民创业的作用机制之一。农民通过使用互联网可以获取大量创业信息[32],同时进一步拓展了其社会网络关系[33],因此互联网的使用对提高农民创业绩效有积极作用[34]。

研究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民的创业水平,而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的三个子维度尤其是数字支持服务指数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二,相比于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三,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乡村地区的农民创业,这体现了数字金融的普惠特性。第四,考虑到人力资本异质性,数字金融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东部地区,数字金融对低学历农民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在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对高学历农民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五,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农民的金融市场参与度和使用互联网学习的频率这两个途径来促进农民创业。

农业经济与管理 张强强

农民创业有利于盘活农业资源、整合生产要素、激发农村生产活力,不仅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带动本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曹瓅等,2019),也可通过创业活动有效解决农村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并在就业、教育、扶贫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但在现实生活中,相比其他群体,农民创业面临的资金周转困难、创业资源短缺、关系网络简单、社会资本匮乏、认知水平不足及心理敏感脆弱等困境更加突出,导致农民创业失败案例屡屡发生,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创业绩效普遍不高(王洁琼等,2018;马红玉等,2020)。农民创业者如何克服先天劣势、提高创业绩效,成为亟待研究的关键问题。

经济、社会、心理三维资本是农民创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三维资本中

单项资本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资本为创业初期提供了资金投入保障,对农民创业绩

效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是获取外部信息和资源的主要途径,能够显著提高创业资源的可得性,

是影响农民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蒋剑勇等,2013;郭铖等,2019)。心理资本作为促进个体成长和绩

效提升的核心心理因素,是促进农民将创业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马红玉等,2020)。在创业

过程中,除各项资本外,农民的创业能力也对创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农民需要通过持续学习来应对

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也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获取有用信息以识别创业机会(朱秀梅等,2019)。在

创业活动中,农民只有发现机会,才能有效规避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才能模仿、改进及创新出新的

产品或要素集合,并开展后续的价值创造活动。在学习知识并识别出合适的创业机会后,农民需要获

取和利用相关创业资源进入创业下一阶段,也需要通过不同途径获取所需的经济、社会、心理等创业资本。目前关于经济、社会、心理等单项资本对创业绩效影响的研究较多,但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研究农民创业绩效的文献相对较少,也忽视了农民创业学习能力、创业机会识别在其资本禀赋与创业绩效中的作用。

中国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农民处于复杂的差序人情关系网中,其与存在亲缘、友缘、地缘和

业缘关系的人员联系频率较高,有助于加速信息传播和资源分享(周晔馨,2012)。其中,经济资本影

响创业资源的获取和创业机会的选择,可以支撑农民选择更优质的创业项目,对农民创业绩效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王洁琼等,2018)。社会资本主要与组织网络和机会识别关联,在农村经济社会中具有信

息共享、风险共担等作用(郭红东等,2013;曹瓅等,2019),农民的社会资本能够显著提高其创业资

源的可得性,是影响其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蒋剑勇等,2013;郭铖等,2019)。心理资本决定创业者

的个人特质和机会把握,对农民创业者的行为能力与群体的组织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程聪,

2015)。因此,农民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均对农民创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提

创业学习是通过获取创业信息和知识来指导企业创立和管理的连续过程,是创业能力提升的关键来源(严杰等,2018)。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可以帮助其快速掌握难以模仿的关键技术。农民创业者由于自身资源的不足,需要同外界建立各种联系以获取创业所需资源,而资源的吸收利用效果取决于其自身的不断学习,在创业过程中,农民创业者可通过学习帮助企业建立竞争优势,进而促进创业成功(芮正云等,2018)。经济资本不仅可以为创业者创业初期及扩张期提供资金支持,还可以为创业者提供学习培训机会,通过创业学习提高经营利润。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农民创业者与具备相应资源的利益相关者的互动产生学习机会,进而提升创业绩效(谢雅萍等, 2014)。心理资本较高的农民创业者通过积极的心理调节处理情绪问题,使其遇到经营困难时仍能保持乐观心态,通过不同的创业学习模式提高创业绩效。因此,创业学习不仅可以直接提高农民创业绩效,而且在三维资本对其创业绩效的影响。

创业学习是农民获取创业知识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创业机会识别的关键要素。我国大部分农民受教育水平较低,创业能力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利用及对创业风险的感知,进而影响创业绩效。当外部环境存在差异时,农民可以选择不同的学习策略来提高创业机会识别能力(严杰等,2018)。农民的创业学习能力越强,越能更好地识别出优质的创业机会。农民在不断变化的创业环境中,需要通过创业学习提升其创业机会识别和资源获取能力,获取有利商机,并提高创业绩效(芮正云等,2018)。部分学者已证实创业学习对农民创业机会识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创业机会识别在创业学习对企业成长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张秀娥等,2019)。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1均有助于获取创业机会识别的知识,在农民后续创业活动中发挥关键作用(郝喜玲等,2019)。也有学者将机会识别分为利用式机会识别和探索式机会识别,发现两类机会识别在学习行为对创业企业

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于晓宇等,2019)。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277539522000383>

数字银行的发展提高了女性对家庭财权的支配能力。

而且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社会，反复观察到的另一个障碍是缺乏政府支持、金融资源和腐败。尽管政府可能为女性企业家制定不同的战略和计划，但这些计划的公布和实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伴随着腐败官员、贿赂、缓慢的官方程序和沉重的税收。

(农民创业的好处)农民创业有利于盘活农业资源、整合生产要素、激发农村生产活力,不仅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高农民收入、带动本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曹瓅等,2019)

（农民创业面临的风险）但在现实生活中,相比其他群体,农民创业面临的资金周转困难、创业资源短缺、关系网络简单、社会资本匮乏、认知水平不足及心理敏感脆弱等困境更加突出,导致农民创业失败案例屡屡发生,创业失败率居高不下,创业绩效普遍不高(王洁琼等,2018;马红玉等,2020)。

（影响因素）（张强）经济、社会、心理三维资本是农民创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三维资本中单项资本对农民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经济资本为创业初期提供了资金投入保障,对农民创业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社会资本是获取外部信息和资源的主要途径,能够显著提高创业资源的可得性,是影响农民创业绩效的重要因素(蒋剑勇等,2013;郭铖等,2019)。、对农民创业者而言,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其开展创业活动并获得成功。农民从金融机构等正规渠道获取创业资源的难度较大、门槛较高,其创业资源的获取更多依赖于亲戚朋友及邻里间的互惠关系等非正规渠道(ZQQ 庄晋财等,2014)。

心理资本作为促进个体成长和绩效提升的核心心理因素,是促进农民将创业潜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马红玉等,2020)。在创业过程中,除各项资本外,农民的创业能力也对创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农民需要通过持续学习来应对创业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也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获取有用信息以识别创业机会(朱秀梅等,2019)。

（数字金融定义）数字金融泛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利用数字技术提供的融资、支付、投资和其他新型金 融服务（黄益平、黄卓，2018）。

(社区的重要性)“通过基层社区使用软技能 [...] 我们研究基于软技能赋权平台转变数字思维定势，通过实际数据、日常实践和亲身体验，而不是阻碍女性参与的信念，最大限度地减少数字恐惧和阻力数字化进化和包容性，”社会企业家 Olga Stavropoulou 说，他是 Militos Emerging Technologies & Services 的总裁、欧洲女性企业家导师（商业导师）网络希腊部门的协调员，以及梅隆大学的首席协调员W'network 通过 Knowl 社会企业的 Mellon Skills Accelerator 提高失业妇女的技能（Kamberidou & Pascall，2020 年）。

社会企业家 Nambiar (2015) 研究了八个乡镇的女性企业家的心理障碍和促成因素。她对南非 3 个省的 8 个乡镇的 40 名女企业家和 5 个小企业支持组织以及 5 个商业发展服务提供商进行了定性的半结构化访谈。如前所述，她的论文侧重于为女企业家开发“独特的社会心理支持生态系统”（2015：51），特别是社会因素和社会期望对个人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她研究了可以促进女性创业的现有支持结构、特征和行为，以及可能抑制或阻止它的因素，例如缺乏自信、自信、雄心和创新精神。根据她的调查结果，最重要的挑战或障碍包括（a）嫉妒和缺乏来自社区的支持，（b）与性别有关的不平等，（b）不支持创业的家人和朋友，（c）批评或使丈夫气馁，(d) 对自己经营和发展企业的能力缺乏信心，以及 (e) 性别歧视：不同利益相关者没有将其作为女性认真对待，包括故意恐吓等。结果表明，对女企业家在乡镇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是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包括情感上的支持、鼓励和一些与业务相关的帮助。最重要的挑战或障碍包括：(a) 嫉妒和缺乏来自社区的支持，(b) 与性别有关的不平等，(b) 不支持创业的家人和朋友，(c) 批评或劝阻丈夫，( d) 对自己经营和发展企业的能力缺乏信心，以及 (e) 性别歧视：不同利益相关者没有认真对待女性，包括故意恐吓等。结果表明，对女企业家在乡镇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是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包括情感上的支持、鼓励和一些与业务相关的帮助。最重要的挑战或障碍包括：(a) 嫉妒和缺乏来自社区的支持，(b) 与性别有关的不平等，(b) 不支持创业的家人和朋友，(c) 批评或劝阻丈夫，( d) 对自己经营和发展企业的能力缺乏信心，以及 (e) 性别歧视：不同利益相关者没有认真对待女性，包括故意恐吓等。结果表明，对女企业家在乡镇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压力认识不足。另一方面，最重要的成功因素之一是朋友和家人的支持，包括情感上的支持、鼓励和一些与业务相关的帮助。

（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面临的阻碍）超越西方背景，研究证实发展中经济体的企业家面临的障碍比西方同行多得多，当你将性别维度纳入方程式时，障碍更大。发展中国家潜在女性企业家担心的主要障碍是社会污名、性别不平等、无法保持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缺乏信息、可用机会、资源、支持和资金；害怕风险；无法做出适当的评估；以及数字鸿沟、数字排斥或缺乏基本数字技能。

（具体的阻碍）如果在一个重视顺从性的社会中，单身女性被认为是独立的、充满活力的、自给自足的或霸道的作为女性最大的资产（女性的害羞和温顺），她在社会上受到污名化，无法找到丈夫（Okeke-Uzodike, Okeke-Uzodike et al., 2018 , Chengadu & Scheepers 2017 , Rajani & Panicker 2017 , Mazonde 2016 ,安瓦尔和拉希德2012 年）。

（创业的重要作用）大量文献指出创业对于赋权、增加家庭收入、减轻贫困、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Francesca Maria Cesaroni、Paola Demartini 和 Paola Paoloni（2017 年）讨论了女性创业在“新兴国家”中的影响，这些国家鼓励创建由女性经营的新企业，主要是肯尼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埃及和南非。在讨论女性在商界以及为什么女性企业家和经理使用社交媒体时，他们认为在这些国家，社交媒体为女性提供了新的机会、网络和灵活性。然而，他们也证实，女性不仅缺乏对成功创业至关重要的基本数字技能，而且还面临与性别相关的社会文化障碍，

（女性面临腐败和金融资源不足）不仅在巴基斯坦，而且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社会，反复观察到的另一个障碍是缺乏政府支持、金融资源和腐败。尽管政府可能为女性企业家制定不同的战略和计划，但这些计划的公布和实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伴随着腐败官员、贿赂、缓慢的官方程序和沉重的税收。女企业家依靠家庭资金、配偶支持或个人储蓄。在家庭资助之后，他们依靠捐款、银行贷款、政府计划和教会慈善机构。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无法提供抵押品，因为她们没有个人资产（Okeke-Uzodike 等人，2018 年；Nsengimana 等人，2018 年；Anwar & Rashid，2012；卡利姆2012 年）。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186/s13731-020-0114-y>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Endrit-Kromidha/publication/349275128_Digital_Microfinance_Crowdfunding_for_Disconnected_Women_Entrepreneurs_in_India/links/60361feb299bf1cc26e84384/Digital-Microfinance-Crowdfunding-for-Disconnected-Women-Entrepreneurs-in-India.pdf>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与微观层面探讨了影响农村妇女创业的相关因素，前者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数字金融发展程度等，后者包括个体年龄、性别、家庭结构、社会资本等。这些因素为理解农村妇女创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将会被纳入本研究的分析模型中。但是，本研究主要从中观层面关注影响妇女创业的村庄治理因素，依据相关的理论框架与治理实践情况，提炼村庄治理相关因素影响农村妇女创业的内在机制与研究假设。村庄作为国家“一线治理“”（）的基本单位与重要场域，其治理形态影响着乡村与农民的发展状况（）。

村庄领导力与创业的示范带动作用。村庄治理普遍存在精英主导的特点，“能人带动”是村庄发展的重要路径（）。具有外出务工经商或企业经营管理经历的村干部能够有效推动村庄集体经济以及私营经济的发展，并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数字金融尽管能够满足农村妇女对于信贷资金的需求，但无法直接提高妇女创业的能力。创业学习是妇女习得行业知识与商业管理技能的重要途径。

而在村集体经济与私营企业工作是农村妇女创业学习的重要途径，能够帮助她们积累创办企业与商业经营的经验。

也就是说，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缓解了农村妇女创业所面临的资金短缺约束，但无法直接提高农村妇女的创业能力。

尽管农村女性能够通过互联网学习到相关的间接经验，但在“做中学”的过程中习得的直观经验尤为重要（引用）。

相关研究发现，村干部和党员的农地流转行为会带动周围的农户做出同样的选择（洪名勇，何玉凤）。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

村干部领导力，特别是经商经历有助于带动农村妇女的创业行为。

民主议事协商与信息公开效应/动员效应？

民主协商议事与信息流动机制。在传统的自上而下的金融信贷资源分配与创业扶持政策执行过程中，农村居民身处在最基层，往往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无法

及时有效地获取创业相关的金融信息与政策信息。数字金融的发展被认为能够破除农村居民所面临的信息壁垒，缓解信息在层级传递过程中导致的失真与滞后问题。

但是，既有研究同样表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数字赋能（digital empowerment），反而会造成新的不平等。由于乡村智力建设相对不足、劳动力素质

相对低下，部分农村居民无法熟练使用数字技术来提升农业生产与自身生活，产生了“数字鸿沟”的问题（杨、操）。

相关数据也表明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在信息消费方面存在“数字鸿沟”的问题（孙）。

而农村妇女在受教育程度方面相对于男性而言相对较低（？数据），在运用数字技术时面临更大挑战。

伴随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相关的负面消息也随之出现，并通过网络极速传播并引发广泛关注。

P2P网贷平台暴雷会引发媒体与公众对于金融科技情绪由积极向消极转变，进而影响金融科技的使用行为（王，黄）。

农村妇女相对而言对风险更为厌恶，金融科技负面舆情的发酵也会使其误认为网络信贷均是诈骗陷阱而借款的非正当门路，从而选择放弃使用金融科技。

而民主议事协商会议是村民讨论决定村庄公共事务的重要场合，但交流分享的内容通常更为广泛，也包括与个体层面的需求与近况消息等。

与村民之间私下交流不同的是，以村民大会与村民代表大会为代表的民主议事协商会通常是由主要村干部进行主导，因此信息分享的过程相对更具权威性和可信性。

而议事协商会议的常态化，有助于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权威性信息在农户间广泛传播，帮助农户树立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正确认识，从而增强其使用数字普惠金融从事创业活动的信心。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村庄议事协商会议有助于鼓励农村妇女的创业行为。

权力监督与技术问责机制。

党建引领的权力监督体系与技术问责机制。

数字金融的基底是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而ICT的快速发展不仅带来了信息分享与生产效率的提升，也引发了信息垄断与社会控制强化的隐忧。

特别是当政治权力与信息权力产生耦合，导致信息权力失去了对政治权力的约束，反而会加剧权力的政治权力的任性与专断程度。

数字金融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滥用政治权力，利用信息技术损害公众利益的案例。例如（插入村干部利用村民身份信息借网贷的案例）

因此，对政治权力实现监督问责对于确保数字金融的积极功能与增益作用十分重要。

对于村干部的监督面临体制性与结构性两个方面的困难。体制性障碍主要存在于党组织书记位于权力链条的最末端，自上而下的监督面临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结构性困难主要是指农村地区的年轻劳动力外流，导致自下而上的主体性监督力量不足。

近年来推动的政党引领的权力监督体系从以上两个方面强化了对于村级领导干部的监督问题。

在自上而下的监督方面，利用常态化的巡视及时发现处置相关的问题线索，并针对村干部的举报实行提档审理，由县纪委负责调查审理，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镇纪委权限不足的问题。

在自下而上的监督方面，出台村级资金使用与公开规定，建设农村三资管理信息化平台，有助于公众从不同途径及时有效地获取信息。

政党引领的权力监督体系有助于实现促进数字金融实现民生增益的功能。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政党引领的权力监督体系有助于鼓励农村妇女的创业行为。

[1]洪名勇, 何玉凤. 论"领头羊"在农户农地流转中的带动作用[J]. 江西社会科学, 2020, 40(6):10.

[1]杨嵘均,操远芃.论乡村数字赋能与数字鸿沟间的张力及其消解[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5):31-40.DOI:10.19714/j.cnki.1671-7465.2021.0070.

[1]孙根紧, and 丁志帆. "情绪波动、信息消费发散与福利分化效应——基于中国省际农村居民信息消费数据的数值模拟分析." 财经科学 1(2015):10.

王靖一, & 黄益平. (2018). 金融科技媒体情绪的刻画与对网贷市场的影响. 经济学 (季刊), 17(4).

## 参考文献

Tran, K. (2014). *The impact of digital media on female entrepreneurship*. Trinit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ubmitted to Dr. Donatus A. Uzomah on behalf of the faculty of the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degree requirements for the Masters of Arts in Communication.

1. Khaire, R. J. (2011).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statutory policies. *ZENI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1 (7), November, ISSN 2231 5780 [↑](#footnote-ref-0)
2. Kalim, A. (2012). Women entrepreneurship. The emerging workforce in 21st century: turning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Proceedings of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Management, ISBN: 978-969-9368-06-6 [↑](#footnote-ref-1)
3. 杨婵、贺小刚 [↑](#footnote-ref-2)
4. 杨婵、贺小刚：村长权威与村落发展——基于中国千村调查的数据分析 [↑](#footnote-ref-3)
5.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创业: 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footnote-ref-4)